

中美關係的演變與歷史的教訓

柳克述

當前的中美關係，在過去一年的危疑風雨之後，可以說是暫時停留在維持現狀的緩和階段。但是美國政府對中共尋求「關係正常化」的政策，並無從新改變的跡象，紙是暫時延擱下來，因此，我們不能不格外提高警覺，而絕不可掉以輕心。

除應由各有關方面多方把握時機，付出更多的人力物力，亟謀對美工作的加強外，同時更應正視美國親共份子那種迂迴曲折，鍥而不舍的荒謬論調，予以有力駁斥，以免一誤再誤的任其不斷影響美國的外交政策。

前當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中美兩國原為並肩作戰的盟邦。然自大戰結束，世局多變，尤其是一九四九年中國大陸淪陷，美國國務院在艾奇遜主持之下，發表白皮書，中美關係已屬不絕如縷。及至一九五〇年六月，韓共大舉入侵南韓，隨後，中共亦悍然出兵「抗美援朝」，於是美國政府「靜待塵埃落地」的對華政策，才開始有了轉變。當時美國政府的決策，是一方面不承認中共偽政權，並由美國參眾兩院聯合決議，籲請聯合國大會譴責中共為侵略者，另一方面逐漸改善對中華民國的友好合作關係，認定中華民國繼續

存在於台灣之事實，不僅為大陸人民及海外華僑希望所寄，而且也是中共不能長期佔據大陸的一項有力證明。同時更認為台灣地區是美國在西太平洋安全體系中的戰略要地，而於一九五四年十二月三日簽訂中美兩國共同防禦條約。因是美國對我國的態度，乃由漠視、放棄，而復歸於密切

友好。

二月三日簽訂中美兩國共同防禦條約。因是美國對我國的態度，乃由漠視、放棄，而復歸於密切友好。

- (1) 派遣密使向中共謀求安排試探性的機密會談，以及試探建立正常關係的遠景。（換言之即為美、匪建交作突破性的鋪路。）
- (2) 注意降低政府人員在言論上對中國大陸有挑激性的爭執，最好完全避免。例如以往將中共比擬為納粹黨，及認定台北為唯一的中國的說法，最使中共氣惱，而有礙於「和解」。
- (3) 修正對中共的禁運，並鼓勵自由旅行及其他接觸，儘可能敞開門戶，以反映出美國自由社會的自信與力量。（換言之，即為「開門揖盜」作辯解。）
- (4) 積極設法改造華盛頓與台北的關係，施以壓力，使台北政府從金門外島撤退，並停止對大陸採取挑逗行動。
- (5) 尼克森政府不應尋求阻止中共在聯合國裏的代表權，反之，正需要有事先的妥善計劃，設法促成中共進入聯合國。

（上項資料，詳見饒大衛教授等所編著「關於中共及其在美國遊說報告書」第七章。）由於美國親共份子不斷以各種方式為中共遊說効力，尼克森遂在「以談判代替對抗」的外交決策下，逐步改變其對華政策。根據以後事實的證明，所謂「費正清備忘錄」的建議，幾乎完

府的建議要點如下：

- (1) 派遣密使向中共謀求安排試探性的機密會

全為尼克森所採納，而成為對華政策的設計藍圖，季辛吉則成為此一備忘錄的忠實執行者。於是在尼克森一九七一年二月二十五日的「世局咨文」中，竟一再直稱中共偽政權的偽國號，復又宣佈放寬與中共貿易的限制，派遣美國桌球隊訪問中國大陸，以求討好中共，改善關係。接着尼克森又密派季辛吉於一九七一年七月九日秘訪北平，隨後即正式宣佈他本人將於一九七二年訪問中國大陸，因而造成舉世震驚的所謂「尼克森震撼」。而且正當一九七一年十月聯合國大會對「中國代表權」問題行將舉行投票表決之際，季辛吉忽又突去北平，安排尼克森的訪問行程，運用其「暗示」方式的影響力，以促成中共進入聯合國的陰謀，實令國際正義人士同深憤慨。

此後，尼克森政府執行費正清等人所設計的

醜劇，更一幕一幕的演出。一九七二年二月，尼克森「打着白旗向北平投降」，並與周匪恩來共同發表「上海公報」；一九七三年三月，美國與中共互設聯絡辦事處；如果不是尼克森因水門事件而去職，也許美國政府與中共建立「關係正常化」的歷史醜劇，就在費正清編劇，季辛吉導演下，早於尼克森任內演出。其後，福特繼任總統，季辛吉蟬聯國務卿，仍舊承襲尼克森的外交政策，但是因為美國在中南半島的慘遭失敗，中共頭目周毛匪相繼死亡，其內部又發生大規模的奪權鬥爭；各種局勢動盪不定，於是季辛吉幻想以「日本模式」來達成對中共「關係正常化」的預謀，才胎死腹中。此種發展，殊出於美國親共份子意料之外，但是他們為達其目的，並不死心。

，仍在不擇手段的繼續進行其叫囂、遊說、與蠱惑的活動，迄今未已。

三

一九七六年十一月，卡特當選美國總統前後，曾提出「維護世界人權」、「尊重國際道義」等口號，似欲挽回美國信譽，重振美國聲威。我們與人為善，當即寄以厚望。（詳見東方雜誌第十卷第十一期作者所撰「從卡特的人權號召論世界人權不可分」一文。）但是為時不久，他又被美國親共份子所包圍蠱惑，因而一變競選期間的含蓄態度，竟宣稱與中共「關係正常化」為美國既定的外交政策，意在仍要走上尼克森季辛吉的老路。幸而其後因美國參衆兩院議員的仗義執言，很多州議會的嚴正決議，以及大多數民意的反應與壓力，再加上其他有關因素的影響，才迫使

卡特總統重作考慮，而指示范錫國務卿於一九七八年八月訪問北平時，祇作試探性的訪問與會談，不作任何原則上的讓步與決定。因為有此種種反响，美國對中共進行「關係正常化」的脚步，乃由急切而趨於緩慢，成為暫時擱置的狀態。目前有些人為此而心神鬆懈下來，甚至附和克拉夫特的說法，認為卡特總統既已改採冷靜和審慎的態度，則此一問題，便可能一直延擱二三年，不致發生變動，似乎無須急謀對策。

不過，我們要知道，此次美國延擱美匪關係正常化問題，因素甚為複雜，而此種因素，並非一成不變，一旦因素之中發生變化，即可影响美

、匪關係正常化的歸趨。因之，此一問題，固非

絕無可能延擱二三年甚或三年以上。但同時也可能於旦夕之間突然發生轉變。正因為如此，我們必須作最壞的打算，趕緊把握目前的關鍵時刻，正視中共的國際統戰活動，而多方設法促進美國大

聽，而免美國政策始終受謬論的影響。關於中共在美國的統戰情形，誠如美國專欄作家艾李華於一九七七年十月十六日所指出的是，範圍廣泛而

態度決絕，他說：「美國人民應注視中共在美國的遊說活動，這是由學術界、商界、及極端自由派人所組成的，他們正在全力活動，促使美國和中共建立全面的外交關係，並撤消對中華民國的承認」。

同時，又如美國作家卜豪瑞茲在一九七七年

十月份的「哈潑斯」雜誌所提出的警告：

「今天在美國姑息的潮流，正如一九三〇年代之在英國，當時除了被譏諷為『戰爭販子』而辭職的邱吉爾這些少數人外，一般英國人對希特勒的企圖，都明知故昧，對他的每一項活動，都為之巧為飾詞，並且聲稱希特勒的每一步行動，都使世界更為接近和平。……時至今日，美國一些姑息主義者，從白宮以至大眾傳播媒介，也對共黨的每一步擴張行動，都給予同樣的掩飾。」

證以美國近來的情勢發展，上述艾李華及卜豪瑞茲兩位專欄作家的看法，實屬信而有徵。例如不久前以前，美國衆議院國際關係委員會亞太事

務小組舉行了一連串的對華政策聽證會，其中就有不少被邀請作證的所謂中國問題專家，如包大可、巴奈特、懷丁之流，仍然以其一貫的成見和偏見為基礎，發表許多汨沒理性，包藏禍心，一味為中共作宣傳的謬論，不僅要求美國政府應立即與中共建交，並主張全盤接受北平所提的「斷交、廢約、撤軍」三個無異向中共投降的條件。又如美國駐日大使曼斯斐德及參議員小甘乃迪等人，或則已於不久以前訪問北平，或則即將前往訪問，均不斷唱出美國應儘速與中共建交的溫調。他如費正清、包大可、克拉夫特等為中共作遊說活動的親共份子，也先後裝作客觀或彈性的姿態，來到台北，賣弄他們包着糖衣的巧言諭辯，企圖說服我國朝野，認為「廢約」無可避免，且亦不必反對，而可以其他方式如所謂美國國會決議案之類，作為代替。其用心無非是為便利卡特政府排除其與中共建交的「障礙」，而又以「口惠而實不至」的所謂國會決議案來表示並不犧牲朋友，以和緩美國人民反對「廢約」及「出售台灣」的空氣。由此可見美國朝野之間的親共份子，在中共統戰的運用下，是無時不在處心積慮，使用各種迂迴曲折的方式與說詞，以期達到其促成美國與中共建交的不變目標。因此，我們應洞悉其陰謀及其可能的發展，決不可因為美匪「關係正常化」的暫時擱置，而稍為鬆懈我們的警覺與各種自立自強的努力。

截至目前止，美國政府尋求與中共「關係正

常化」的決策，前面已經說過，祇是暫時擱置，而不是長期凍結或徹底改變。縱使美國政府人員一再表示，美、匪建交並無「預定時間表」，但若干國際人士的看法，認為以下幾個關鍵時刻，都有使美、匪建交問題發生突破的可能：其一是假定一九七八年春季，巴拿馬運河新約獲得美國國會通過；其二是假定在一九七八年十一月，美國國會期中選舉之後；其三是假定一九八〇年十一月，卡特競選總統獲得連任，這算是最遲的一個日期。以上所說的這些預測，無論時間上的遲早，都是認為美國與中共「必然建交」或「終會建交」的一種落入悲劇陷阱的宿命論，非我們所能接受。我們為着世界人類真正的和平幸福，為着中美兩大民主自由國家的永遠利益，實不願見今後的美國政府竟會「明知故昧」的終於陷入中共國際統戰的圈套，更不忍見卡特總統又蹈尼克森的覆轍，甘受親共份子謬論的影響，而在對華政策上作出「後悔莫及」的重大錯誤決定。因此，我們不得不根據歷史的教訓和正確的論斷，嚴正駁斥親共份子的謬論邪說，同時呼籲卡特總統衡量實際利害，辨別真是真非，認清孰敵孰友，而與國際邪惡勢力作一番「釜底抽薪」的奮鬥。

綜合美國親共份子所提出的主張來分析，大都是些「似是而非」及「囿於成見」的謬論，正所謂陳腔濫調，原本沒有辯論的價值；但為使美國友人在所謂「中國問題」上能夠得到正確的

認識，在敵友觀念上獲致應有的澄清，茲特就其最易引人迷惑的所謂「聯中共以制蘇俄，才能維持世界和平均勢」的主要觀點，作以下扼要的駁斥：

(一)就美國世界戰略而論：美國親共份子慣於根據所謂「世界戰略」及「均勢制衡」的理論，主張拉攏中共以制衡蘇俄。這是出於我國「以夷制夷」的老策略，以中共的狡詐陰險，對這種「聯甲制乙」的鬭爭策略的瞭解和運用，可能遠比季辛吉等人還要高明。很明顯的，中共目前之所以對美國採取「笑臉外交」，其用意完全是為了要拉美以抗俄，進一步更希望能挑起美蘇爭霸的大戰，而中共的覆轍，甘受親共份子謬論的影響，而在事實上，以中共目前軍事裝備的落後，經濟力量的衰竭，加以內部不斷發生權力鬭爭和派系分裂，實在沒有多少足以供美國制衡蘇俄的戰力。至於中共炫耀的中國大陸八億人口，在實際上亦絕非中共強大的資產，相反地一旦有了起義抗暴的機會，且將是推翻中共殘暴政權的主力。所以美國在政略戰略上，都無乞靈中共，以借助中共制俄的可能和必要。更何況中共在一九七七年八月舉行全黨十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時，已將「反美」列入其新黨章，華國鋒且在對該會的政治報告內，一再強調美帝是全世界人民的共同敵人。因此很明顯的可以看出，中共目前之與美國打交道，乃為暫時性的策略運用，其終必「埋葬美帝」「赤化全世界」的一貫政策和終極目標，是絲

毫木變的。如果美國在「聯中共以制俄」的錯誤決策之下，認敵為友，且給予經濟、科技、軍火等支援，則除了徒然幫助中共壯大其自身外，以中共慣於損人利己的本質，美國決不可能得到其制俄的助力。而且在今後國際局勢一旦有變時，更無法防制其反噬，到了「養虎傷人」的時候，美國必將反受其害，那時美國又將聯誰「以制中共」呢？這種可能「反噬」的苦果，美國應該不會忘記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曾經「聯俄以制德」，而在戰後一直到現在，又深感難於「制俄」的歷史教訓吧！總之，美國應切實記着，無論對共黨國家或共黨政權，都是千萬「聯」不得的！再說，中共最擅長的陰謀策略，是「既聯合、又圖爭」，如果中共與美國建交的陰謀得以實現，自將更加有利於中共各形各色的特務，在美國進行滲透顛覆的活動。

中共勢必利用美國人民內部的各種矛盾，從事加深和擴大的煽動，以製造美國的危機四伏，秩序大亂，那時美國受禍已深，其後果還堪設想嗎？由此可見美國親共份子不斷媚中共以「引狼入室」的荒謬主張，不僅危害中美盟邦的友好關係，更屬危害美國本身

(一)就中共意識型態而論：中共是奴役人民，蔑視人權，與蘇俄同屬侵略陣線中反民主自由的國際共產極權組織，在本質上是絕對無法與美國和平共處的；除非美國能屈辱投降，接受共黨赤化統治，否則，遲早必被「埋葬」

(二)，祇不過也是所謂尚無「預定時間表」而已。而我中華民國則是尊重人權、厲行法治的民主國家，美國林肯總統「民有、民治、民享」的崇高理想，與我國國父「民族、民權、民生」的建國主義，實屬東西輝映，若合符節。因此，亞洲有我自由民主的中華民國存在，才能配合自由民主的美國，共同維護亞太區域的和平，也才能真正符合美國的國家利益。相反的，如果美國政府竟忍受或縱容中共的侵略與擴張，且不惜與之建交而深相結納，其最後結果，勢必在利盡交疏之時倒戈相向，而嚴重威脅美國的安全，為世界人類帶來無窮的災禍，其間且必然引起亞太地區許多國家的危懼猜疑，紛紛離散，認為美國是背棄立國原則，漠視國際正義，意識型態模糊不清的終不可靠的朋友，其結果，勢必演變到美國原有的朋友，都不敢繼續與之作朋友了；而美國在先天上的潛在敵人，却終久是美國的敵人！猶憶一九七六年十一月美國兩黨總統候選人競選時，有人指斥當時美國政府的作法，是「苛責朋友、寬待敵人」；隨後國際間亦有一種說法，認為「做美國的敵人，易，做美國的朋友，難。」此皆美國親共份子「不分敵友」，混淆是非的謬論所造成的現象，言之寧不令人痛心疾首！

(三)就亞太地區戰略地位而論：美國是一個太平洋國家，必須維護亞太地區的安全，使不被共黨赤化，才能確保美國本土不受敵人威脅。而台澎地區，則又為美國在西太平洋一個極為重要的據點。在美國歷史上具有卓越貢獻的名將，且對亞洲情勢有着深刻瞭解的麥克阿瑟將軍，就會鄭重指出：「如果我們放棄或是失去台灣，則等於喪失了太平洋！我們決不能任令台灣落到共黨手裡。」這真是一代名將的真知灼見！我想，凡具有相當軍事知識的人，都會認識台灣在美國確保太平洋安全上的戰略價值，確如麥帥的評話。如果美國一旦被騙對台灣地區「撤軍」「廢約」，或以其他方式表示放棄，則誰能保證美國的潛在敵人中共，不會冒險侵犯台灣？又誰能保證虎視於側的蘇俄東方艦隊，在逆料國際局勢有變的情況下，不會搶先侵略台灣戰略要地，企圖控制台灣海峽，並以控制中國大陸沿海及自中東至遠東各國之石油通道？一旦大戰突然發生，此西太平洋第一防線既已突破，不獨「三邊之一」的日本失其屏障，即美國本土亦豈能置身事外，而不被戰火波及？所以美國親共份子因討好中共而主張放棄台灣戰略要地，同意「撤軍」「廢約」的謬論，實在是極端的短視無知，非愚則妄！

(四)就防制中俄兩共重修舊好而論：據我們的瞭解，蘇俄對於中共領導頭目的爭取共黨國際領導地位，早已恨之入骨，形成勢不兩立的僵局，而且蘇俄對於廣大的中國大陸，原有其傳統的侵略野心，三百年來，迄未間斷，絕不可能再與中共水乳交融，而不發生利益衝突。所以今日的中共，無論是華匪國鋒當

權，或鄙視小平當權，再或以後由另一派人翻倒華鄧而當權，蘇俄對於此等一貫「反蘇修」的中共頭目，都必將懲前毖後，決不會寄以腹心，與之真誠結合。而中共頭目之對於蘇俄，亦因格於其內外各種情勢，決不會也不敢放棄「反蘇修」的一貫教條和政策。因此，美國實毋須作「杯弓蛇影」式的自相驚擾，害怕中共又有向蘇俄「一面倒」的情事發生。我們要瞭解，共黨國家或共黨政權之間，純粹只有利害關係，絕對沒有情感與道義，過去毛匪澤東之所以「一面倒」向蘇俄，完全是爲着要仰仗斯大林的扶植，尤其是要仰仗斯大林獲自日本關東軍投降繳出的大量軍械與物資，全部交給毛匪，以壯大其侵佔東北乃至侵佔整個大陸的實力。一旦目的既達，羽翼既豐，斯大林旋亦死亡，毛匪便要由「一面倒」而站起來，更要與蘇俄爭奪共黨國際的領導權了。從來小人相處，見利忘義，利盡則交疎，甚或倒戈相向，往往視爲當然，而共黨國家或共黨政權則又爲小人之尤者，實毫無疑義。所以美國親共份子爲防制中俄兩共重修舊好而力主美國與中共建交的謬論，實在是理論上站不住，事實上亦不可能。美國卡特總統在一九七七年二月發表爐邊談話時，曾經強調：「我們的政策，應基於與我們盟國的密切合作，及舉世對人權的尊重；它必須經常能反映出我們自己的道德價值」。其言實屬高瞻遠矚之論，且具有偉大政治家的抱負。但願卡特總統今後

毋爲親共份子的詭辯危言所欺騙，而能以堅定明智的決策，實踐其崇高的諾言，並認清敵友，權衡是非，堅決鞏固中美深長的友誼，維護民主公正的傳統，方不致幫助了潛在的敵人，背棄了真正的盟友，而有損其尊重人權的基本立場和道德價值。

五

最後，吾人尚有不能已於言者，即從最近三十多年來中美關係的歷史紀錄中，不難發現自一九四五年雅爾達會議前後開始，美國政府的對華政策，即會發生嚴重偏差，連續鑄成大錯。之所以造成如此重大不幸的原因，最主要的就是美國最高決策者以及政策執行人，常常受了親共份子及其同路人的蒙騙迷惑。例如霍浦金斯與希斯，在雅爾達會議中對羅斯福總統之影響；戴維斯與謝偉志，對史迪威來華服務期間之影響；以及范寧德、拉鐵摩爾與謝偉志等人，對馬歇爾使華期間之影響。以上情事的累積，窮原究委，即爲造成中國大陸淪喪之主因。而事後並經事實證明，希斯與謝偉志不僅親共，且確爲共黨間諜，而受到美國的國法制裁，宣判入獄。此中因果，今日說來真足使人寒心！而後之視今，又正如今之視昔，哀辭，凡二十篇，皆屬粹精之作；而其生平偉製，尤推通鑑之史論，故採取六篇，冠之於首，以見一斑。

司馬光文

黃公渚選註

人人文庫二二五一—五二

定價十八元

臺灣商務印書館發行

喜讀文史書籍的朋友，可將
此冊納入囊篋。

，瞻念世局前途，寄此殷切期望。

中華民國六十七年元月